

王铭铭 著

王铭铭

XIN SHI JI XUE REN WEN CUN

自

选

集

新

世

纪

学

人

文

存

1962年出生于福建泉州，
1981年就读于厦门大学；
1987年赴伦敦大学东方非
洲学院学习社会人类学，
获得博士学位后曾任职于
伦敦城市大学、爱丁堡大
学；1994年以来服务于北
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
所，现任该所教授，其间
兼任美国芝加哥大学人类
学系访问教授、民族学院
客座教授。主要研究方向
包括社会人类学理论与方
法、汉学人类学理论、地
域研究、民间象征与仪式、
文化研究等。至今已发表
学术论文60余篇，出版《社
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
(1997)、《文化格局与
人的表述》(1997)、《村
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利》
(1998)、《逝去的繁荣》
(1999)、《社会人类学》
(2000)等专著，并主编
《乡土社会的秩序、权威
与公正》(1997)、《象征
与社会》(1997)等论文集。

王铭铭 著

新世纪学人文存

王铭铭

（自）
（选）
（集）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王铭铭自选集 / 王铭铭著. —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12

(新世纪学人文存)

ISBN 7-5633-3134-4

I. 王… II. 王… III. ①王铭铭-文集 ②社会学-文集 IV. C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83019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 36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电子信箱: pressz@public.glptt.gx.cn)

出版人: 萧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地质印刷厂印刷

(广西南宁市建政东路 邮政编码: 530023)

开本: 889 mm × 1 194 mm 1/24

印张: 16 字数: 350 千字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 ~ 2 000 定价: 24.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出 版 说 明

我社出版的《跨世纪学人文存》(23种)自问世以来,受到学术界和读者们的重视和欢迎,认为是新时期思想文化学术的一个总结性工程。这对我们也是极大的鼓舞。而今,我们接续前思,整理编辑近年学界新锐的重要成果,感到大美纷然,目不暇接。几经讨论,初辑九种,科学与人文兼收,精思与沉潜并重,而主脉不变,在乎平实而富有建设性的研究。我们深知,在此商业时代,要保持这种纯粹而深邃的关怀殊非易事,但是这种关怀却是不可或缺的,它关系着一个民族的精神血脉。我们力求为这样的关怀提供一种与读者对接的平台,以期学术繁荣和民族进步尽一分绵薄之力。这套丛书与新的世纪同时来临,亦将与新世纪同行,故名之曰《新世纪学人文存》。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部

2000年11月

自序

几个月以前,“新世纪学人文存”出版者约我从已发表的论文中编选一部“自选集”,我接受了这项稿约。在为时不太长久的岁月里,我从事了一些研究,发表了一些文章,现在有这样的机会来回顾和反思自己,实在是难得的事。不过,我私底下对编选这部文集也感到了一种不安。尽管我和我的同龄人在现实生活经历的意义,都已经拥有了一定的“时间资本”,但在学术上我们却又属于一个刚刚开始的时代。身为一位年龄在世纪转折时代刚接近不惑之年的人,轻易地给自己一个诸如“新世纪学人”之类的时代性定位,恐怕不无问题,甚至可能颇显自恋。在一年以前反观自身,我或许还能给自己一个比较明确的定位。但在被人们称为“新千年开端”的时刻来回顾我的学术历程,却让我觉得自己无非是一个不确定的历史时刻的产物,因而有着深刻的自我定位困境。

在自我定位困境中写出的那些论著,自然而然地表达着这种困境。我是从80年代后期才开始发表一些译文和述评的,90年代初期开始,我逐步进入独立研究和写作的阶段。从大学算起,我踏入大学门槛大略只有20年,而从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算起,我从事独立学术研究的时间只有14年。诚然,与那些被削减了30多年学术生命的老一代学

者相比,我们这一代人可以算得上是幸运儿,因为我们的年龄比他们小得多,但在20年前却能够与他们一道进入学术的宏伟殿堂,享受知识的新鲜空气,也有着更多时间和机会来琢磨学术走向的问题。然而,十几年的时间毕竟是十分短暂的,而因为时间的短暂,我命定地要在一个充满不安的心境中,经历必须经历的困惑和变化。

十多年来,我的研究零散地分叉为三种不易合一的线路。从80年代后期以来,深受那些热衷于重建人类学的老师们的影响,我试图以自己所能完成的有限译述来协助老师们展示这门学科的视野和意义。从时常是十分生硬的翻译开始,到带有一点个人见解的述评,我花费了不少精力参与学科基础理论和方法的介绍工作。与此同时,在至今已正式发表的五六十种论文和专著中,我也有意无意地走进了学术研究的第二条思路——这就是试图在“西学”——其实不存在统一的“西学”——的理解中发展出一种相对自主的学术视野。依顺这一条思路,我对西方人类学,尤其是西方人类学者对于中国社会的研究,进行了我至今仍然认为有必要和有意义的批评和对话。不过,矛盾的是,我的批评和对话,大多不来自本土主义的文化观念,而首先是部分基于80年代以来的学术思潮(如后现代主义)而延伸出来的。这也就意味着,这样的批评和对话具有内在文化价值矛盾。到过去的两年,我应一家出版社之约,开始撰述一部社会人类学的导论性著作,我重新思考了自己的一些论点和论据。这一重新思考,促使我转向对于现代西方人类学自我文化批评精神的再阅读和再论述。当然,除此之外,在过去的十来年中,我还持续发表一些有关中国的历史、社会与文化的论著。基于我在伦敦大学从事博士论文和博士后研究那总共七年期间所学到的知识和所从事的实地研究,我利用闽台地区的社会人类学和地方史案例,试图从“小地方”窥见“大社会”,以此达到对当前社会变迁的一种认识。

我自觉到,自己近些年发表的论著,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论点上,都存在着诸多粗糙、不连贯以至自相矛盾的地方。重读自己写过的东西,我发现了很多我本来应当避免、或者说现在能够比较容易避免的文字粗糙、论述混乱的地方。除此之外,在很多论著和译述中,论点和

论述风格的矛盾,也广泛存在。例如,对于西方的世界观,我有时是批评的,有时却是欣赏的;而我对于中国民间社会与文化的研究,有时过多地强调对于域外观点的借用、论证和检验(如《社区的历程》[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有时则过多地强调本土概念的解释力(如《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更有甚者,我过去十几年的学术研究,分化为相互之间关系不是十分密切的脉络,有时注重学科基础理论的述评,有时注重地方性的案例研究,并未形成论证合一的理想学术风格。存在诸如此类的不连贯和自相矛盾,显然是因为我还没有找到一个有力的自主解释框架,而在缺乏有力的自主解释框架的情况下编选一部“自选集”,肯定有着很大的难度和问题。不过,这样或那样的不安和困惑并没有让我推却出版社的邀约。我感到,编出了这部文集,有助于自己对过去的研究和思考进行一个初步反省和梳理,而这一初步反省和梳理,可能进而能够有助于未来的学习和研究。

倘若一定要我对本文集作一个逻辑说明的话,那么,我这里想做的,可以说是在比较全面地反映零乱的个人研究思路的基础上,寻求不同论述风格的某种可能的结合点。大略而言,读者可以把这部集子的11篇论文分成三个部分来阅读:第一至第三篇论文主要反映我对人类学在现代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地位、人类学的中国问题研究及中国文化研究存在的问题的认识,第四至第八篇的五篇论文主要来自个人对于民间社会与文化的地域性实地考察,第九至第十一篇论述现代场景中人类学观察的意义。为了适应文集的一般形式,除了个别的文字改动之外,我比较完整地保留了文章的原有风格、内容和论点。这样一来,我的这部文集也就保留了我的研究和论点的不连贯性以至不一致性。所幸的是,这本书的定位是文集而非专著,而文集的风格本来就比较能够使读者宽容其所包含的多样性。在编选论文的过程中,我确实还是费了一些心思努力在所发表的文章中选出一些相互之间相对连贯的作品,以期尽量减少论点和内容的不一致性。那么,有什么样的主题可以把我的零散思考贯穿起来?在编选文章的过程中,我曾经想选择学科基本理论述评为主题,也曾经将我的地方性专题研究论文合为一集。

但是,考虑到近年我已经在这两个方面分别出版了几部作品,更考虑到应真实体现我近年研究的面目,我放弃了这两种可能的做法。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集子,可以说是一种理论和实地研究论文的综合文本,并且,这一文本基本上符合社会人类学的路子。这些文章的风格、内容和论点都有所不同,但它们大多从不同角度涉及一个潜在主题——广而论之,被收入本书的11篇文章在不同程度上都论及现代性与知识塑造之间关系的问题。

具体而言,第一部分的三篇文章以中国人类学与现代性建构之间难以割裂的关系为基础,考察了这门学科的前辈在论述中国文明体系和社会结构的独特性时所面临的认识问题和机遇,尤其集中考察了中国人类学史的总体概貌、吴文藻早期对于民族与国家的文明进程的论点及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对于中国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展开的论述。在第一篇论文中,我对“冷战”结束之前中国人类学的演变作了一种话语分析,这一分析基本上能够说明,人类学学科在中国的传播和本土化,与不同时代现代性的制度和话语的建构形成了密切关系,而因为中国人类学学者长期以来自动或被动地关注如何在传统中国的“废墟”上建设一个政治一体化的国家,所以其所依据的认识论体系充满着文明疆界建构的考虑,而缺乏“以他人来反省自身”的世界主义色彩(这是现代人类学研究的人文价值宗旨)。不过,对于吴文藻的《民族与国家》(1926)的阅读(第二篇),使我看到中国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学科建设者一度有机会在知识的普遍意义追求的基础上来讲述“国家的故事”(值得一提的是,我一直认为,这种风范在后来的削弱是中国学术文化的悲哀)。第三篇文章是针对海外著名汉学人类学家弗里德曼而写的。对弗里德曼著述的分析,能够体现西方人类学者在认识中国的过程中所提出的与中国学者不同的论点。诚然,正如文章指出的,来自西方汉学的论点,存在着对于某种“异文化的想象”,但其将中国与欧洲近代民族—国家相区分的做法,正体现着20世纪西方人类学的一贯努力。20世纪的西方人类学(尤其是欧洲社会人类学)一直试图在近代以来欧洲民族—国家的政治现代性之外寻找替代性的“传统政治体系”。现在看

来,这一努力对于中国人类学论述体系的重建是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

在中国人类学史上,对于本土社会与文化的论述大抵是依顺着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形成的两种脉络展开的。其中一种深受当时美国文化人类学的影响,注重作为“境内异文化”的少数民族群体的社会历史的探讨,这种研究到 50 年代与来自苏联的民族学相融合,转化为社会进化论(或社会形态进步过程论)的民族志。另一种脉络,则建立于英国社会人类学和美国芝加哥学派社会学的结合基础上。这后一种脉络的研究,集中于汉族社区,关注社会变迁的现实问题(因它的功能主义主张,在 50 年代以后的 30 年中曾长时间遭受政治否定)。这两种研究风格分别从历史和现状、边缘族群与主体社会的不同角度,体现着中国知识分子在现代性“文明布道”方面的使命感,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中对现代性的焦虑。就人类学学者群体而言,对于那些原始的“原生族群”的论述及对于那些乡土中国的地方性共同体(社区)的论述,分别反映着新兴民族—国家与“传统社会纽带”的关系。然而,有意思的是,甚至时至 90 年代,我们有相当多的学者,仍然有一谈现代性就“谈虎色变”的态度。在我看来,我们的知识分子使命感和言论态度之间之所以存在这样的矛盾,是因为 20 世纪中国知识界的主流持续地将新兴民族—国家及其现代性的创建当成不必论证、不容置疑的前提。我的前辈和相当大部分的同代人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深潜于现代性制度和话语的建构之中,但是却因为某种难以言表的原因而不能或不愿去认识和表达现代性与我们社会之间构成的关系。对于我们这个时代而言,这样一种知识的状况所带来的后果是需要引起关注的(妨碍着我们走向世界、走向人本的各种本土主义学术—政治主张,都与这种知识的历史状况有关)。

我在第二部分收入的五篇论文,基本上都是在这样一种学术现代性的问题意识中写成的。五篇论文的所有资料都来自 1987 年以来我在福建和台湾地区从事的实地考察(依据这些实地考察,我已发表《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北京,三联书店 1998 年版]、《逝去的繁荣》[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等作品,本书选入这些作品的个别章节及

新近发表的两篇论文)。倘若我们可以根据现代性传播的途径来区分核心和边缘的话,那么,这些实地考察都是在当代社会的边缘地带展开的。在展开考察和论述的时候,我依据社会人类学的基本认识论立场将边缘当成核心,试图通过展示被人们界定为现代性对立面的民间文化、地方制度、地方象征和仪式等体系,来达到反思现代性的目的。

从19世纪末起,欧洲一些优秀的社会理论家就认识到,现代性缘起于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文明进程”对于等级分明的传统文化类型的取代,缘起于作为想象的民族共同体的“社会”对于传统分立的面对面地方性共同体的取代。一如许多论者指出的,世界上并不存在完整实现的纯粹现代性,而那些想象中终将被取代的文化形态,也并没有随着现代性的成长而消失。在中国,尽管知识分子的论述更多地集中于一种单向的社会进化史的展现,但事实上的所谓“社会变迁”和“文化变迁”向来交织着多种层次的时间维度。那些被社会理论家和政治观念言说者排除在外的“非现代的”文化形态,构成我们意想中的“现代性”没能“彻底改造”的文化模式,其对“过去”的强烈关怀,使我们的历史感和社会感增添了多元化的可能性。那么,这些来自实地考察的洞见,又能为我们的认识提供何种启示?在第二部分的五篇论文中,我要说的基本上是,民间文化出乎学者意料之外的持续存在,说明我们的学术话语长期以来深受传统/现代二元史观的社会进化论制约,而这种社会理论不足以反映文化的历史。在这个论点的基础上,有四篇论文分别从现代化的民间传统动力、现代学校的地方象征改造、文化遗产的民间仪式重构及传统再创造中的地方政治力量等角度,论证了这个基本看法。接着的一篇有关19世纪末东南沿海一次“跨世纪”的超度仪式的论文,则试图从更长远的历史时段和突发事件来反省现代民族主义成长与此前地方社会中的仪式展示的认同感之间的差异。显而易见,这样一些充满地方色彩的论述,不能全面代表20世纪中国丰富的文化景象(尤其是,我对于汉人地方社区的研究,不能取代人类学向来专长的族群文化研究)。但是,我一直认为,通过社会人类学地方性研究——即专业上称之为田野工作

和民族志的研究——所获的一管之见，也许正能说明现代性的宏大叙事的排他性缺失。

第三部分包括三篇论文，它们也是围绕着现代性的问题意识而撰写的。第一篇文章不属于严格的人类学论文，而是针对90年代文化研究展开的简要回顾。90年代，“文化”的概念在中国学术界占有显要地位，无论是那些追求在可论证的“社会事实”中寻求规律的实证论者那里，还是在注重思想的解释和反省的批评论者那里，“文化问题”都一时成为我们关切的要点，而在两种脉络上展开的研究，都存在过去强调和相信现代性必然通过全球性传播而最终消灭过去的文化的倾向。这一对于现代文明进程的最终后果的预见，可能适合解释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但它却因忽略在中国社会和思想中同步呈现出来的传统文化复兴潮流，而重复了文化研究的批评对象犯有的社会进化论失误。值得注意的是，同样的问题在海外传媒文化的研究中也存在。近年海外人类学界出现了对于传媒取代文化、文化研究取代人类学的恐惧。事实上，传媒的发展不仅没有导致文化的消失，而且为不同时代和类型的文化开拓着新的解释和表现的渠道。有不少人类学者依据对世界体系、高新技术发展等的观察，认定人类学研究必须随着世界性的文化变迁改变方向。而与此同时，我们却看到了一种更符合事实的论点的提出。这个论点为我们指出，“文化终将消失”这个论点，似乎是当今社会科学研究者的新发现，其实，它无非是18世纪以来西方启蒙运动带来的“文明布道”使命观的再现。基于这种看法，我试图在第二篇文章中反思人类学和民间文化研究的“文明布道”心态，引用有关村落和理论反思的论据，我试图指出，长期以来中国民间文化研究存在着传统—现代的二元论史观。在这一论点的基础上，我主张人类学的民间文化研究应当打破这样的二元论单线历史，在日常生活的复杂性中获得文化的新视野。接着的一篇论文，则试图重新澄清人类学与现代性话语之间的关系。后现代主义者认为，现代（西方）人类学的总特征，是这门学科在论述体系和话语内容方面浸染的没有反思的现代性，而后现代人类学的必要性，正在于驱除

现代性在人类学中的阴影。我曾接受这一观点，认为现代性的焦虑是中外人类学的共同特征。但是，在这篇新近写出的论文中，我对自己以往的看法有所改变。我认为，相比其他学科，西方人类学更早地反思了现代性的问题：人类学者向来注重研究那些现代场景中“并不消失的文化”，力求在现代性的“他者”那边寻求文化的替代性模式，由此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观保持一种清醒的反思。基于这一看法，我对后现代主义人类学者对于现代人类学的批评提出了质疑，认为对非现代传统进行“浓厚描述”的现代社会人类学，正是这门学科能够自我反思地思考西方启蒙运动和现代性带来的问题的集中表现。

“现代性是一项未竟之事业。”——对于理性选择论者和自发的社会进化论信仰者而言，现代性是知识分子应该为人类书写的未完成的篇章。在政治和文化价值观念上对现代性的重新肯定，正在诸多学科的学术前沿地带崭露头角，而总体看来，这样一种现代性启蒙的使命感之所以在世纪转折时期再度受中国学人的推崇，主要是因为学者们认定，我们社会面临的问题是广泛存在的“非现代性”引起的。毋庸置疑，倘若我们采取进步论的立场，那么，我们将会看到，作为现代性主要内涵的所有权、公民权、国家认同、文化一体性等制度因素在中国发展的不成熟，影响着中国人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生活，从而也局限着现代性在中国发展的空间。同时，对中国知识与社会的考察，可能也会使一些人更坚决地相信现代性的未竟之事业所能赋予我们社会的意义。然而，20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教诲却在于，尽管我们已经采取许多不同的方式来建构一个“现代中国”，但那些“非现代的力量”并没有轻易地退出历史舞台。本书第二部分的几篇论文试图呈现的，就是民间传统——这当然并非是一元的传统——在现代场景中得到延续以至再创造的状况与背景。进一步的研究应能证明，民间文化的非现代逻辑在被我们想象为现代的那些领域中——如在传媒、政治行动、贸易等领域中——也广泛存在。中国的现代性计划者和推广者如此坚信这项事业的社会改造力量，以至于在看到它不能完全取代一切之时，便要表达其“高尚的历史悲哀”，便要将所有

的后果归罪于那些现代性以外的因素。对我而言，到了一个新的世纪，民间文化与社会形态的顽强持续，正说明现代性的无力以及我们思考的局限。

也许，我在上面所说的一切，还是难以将本书选入的不同文章串成一个相互关联的论点。为此，我特别希望读者对于本书收入的文章之间的论点矛盾给予宽容。我也认为，这里有必要反复强调，被收入的这些文章，在相关性和连贯性方面存在两种不同情况。例如，第一篇关于中国人类学史的文章和最后一篇关于西方现代人类学的文章，因写作时间比较接近，故连贯性也相对强一些。同时，民间文化的具体调查，也能够表达我对于被研究对象的知识与现代性的反思之间相关性的一贯关注。然而，第三、四篇论文对于知识“文化霸权”的过度批判，显然与前面提到的第一和最后一篇文章的看法存在矛盾，而正如前文指出的，同样的矛盾存在于最后两篇论文之间。同样地，我对弗里德曼理论和西方人类学有关中国研究的批评，与有些文章中对于这些理论体系的引用，显然也存在着内在的紧张关系和矛盾。然而，我在这里也特别希望读者看出，尽管本书存在着上述问题，但在写作和编选这些论文时，我还是一直怀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期待，希冀理论和实地研究的对话，能够促使更多的人来重新思考我们长期使用使用的历史因果关系逻辑，希冀社会改造的“立法者”和“解释者”都能够至少暂时地超越人类宏观历史的进步论想象，走进日常生活的角落，去发现更多的历史可能性，从中体会“现代性是一项未竟之事业”的其他可能解释。我也一直坚信，社会人类学开拓的视野，对于这样的重新思考的体验，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自己近年写出的这些不成熟的文章，是否已经说明了我要说明的问题，是否真的能够促发上面提出的那点思考，都不存在明确肯定的答案。我更不拟认为，这些不成熟的文章包含着某种对于新世纪社会变迁的前瞻，我这里想说的无非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历史上的许多老问题，在新时刻时常会以“新问题”的面目重新涌现。我因而希望（仅仅是希望而已），自己于20世纪末期对20世纪的某种回顾，能够隐含着对可能重新涌

现的老问题的看法。

附 记

本书基本上依据“新世纪学人文存”丛书的出版者提供的规范编辑出来的，但为了保持文章原版的面目，在引文注解方面，我保留了几篇文章的西式参考文献列举风格，而没有采取出版社规定的脚注方式。我必须感谢出版社为本书文章的编选提供的高度自由。我还必须感谢美国芝加哥大学给我的访问教授聘任，这部文集是我就任该大学人类学访问教授之职的最初一个月编成的，而人类学系 Marshall Sahlins 教授及行政秘书 Anne Ch' ien 女士为我租下公寓，让我能从窗口一下看到整个芝加哥城和一望无边的密须根大湖，这给我平静的心情来完成这篇简短的前言。当然，这本书收入的文章，是在不同的时期写成的。在不同的时期，很多老师和同学给了我诸多珍贵的启发和帮助，这里难以一一列举。

在写完这篇前言之际，妻子匆忙打来电话，说母亲已因患癌症在家乡逝世。这几个月来，我一直生活在患病的母亲的影子中。在她患病期间，我曾三度从北京飞到家乡泉州探望她。可是，我现在却远离家乡，无法参与她的追悼会，也无法目送她离开这个世界，尽儿子最起码的孝道。母亲于 30 年代出生于闽南沿海一个很小的村庄，后来离开家乡在外求学，后任职于泉州第一医院。在 60 多年的生命中，母亲坚强地经历了我们社会最为波折的那些年代。尽管她生活的地方“天高皇帝远”，但从远处促发的社会变动，还是给她带来了本来不该有的辛劳和波折。十多年来，我的实地考察工作一直集中在闽南地区，涉及我家乡地方的历史和社会生活。母亲的逝世，一时让我觉得自己现在写的文章，离她一生的经验很远又很近。我曾希望，自己虽然应当撰述学术规范要求我做的文章，但是这些文章至少应在某种感觉上涉及像父母这样的人的人生经验，而倘若这文集还能有一点点这样的因素，我就十分满足了。我还记得小的时候，在我刚学会写第一

个字、画第一张画的时候，母亲都高兴地把我那些胡乱涂画的纸字拿着到处炫耀，倘若她能看到这部书的出版，一定会同样高兴的。

作者

2000年1月20日

于芝加哥湖滨寓所

目 录

自 序.....	(1)
西学“中国化”的历史困境	
——以人类学为中心的思考.....	(1)
民族与国家	
——从吴文藻的早期论述出发	(40)
宗族、社会与国家	
——对弗里德曼理论的再思考	(70)
现代的自省	
——田野工作与理论对话.....	(109)
教育空间的现代性与民间观念	
——闽台三村初等教育的历史轨迹.....	(146)
现代场景中的灵验“遗产”	
——围绕一个村神及其仪式的考察.....	(171)

地方政治与传统的再创造

- 福建溪村祠堂议事活动的考察…………… (212)

危亡与超生

- 1896年中国东南沿海的超度仪式…………… (250)

过去十年文化研究的内在困境

- 对有关论述的质疑…………… (290)

在日常生活中发现史诗

- 民间文化研究与多元史观的建构…………… (302)

他者的意义

- 论现代人类学的“后现代性”…………… (332)

- 主要著述一览表…………… (362)